

二十五史随笔

荆门煮雪

元史随笔

周维强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十五史隨筆



二十五史隨筆

陳寅恪 著

廣西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随笔

薊門黃昏

元史随笔

周维强 著

I067
2246

浙江文艺出版社

SBN 62/66

作 者 周维强
丛 书 名 二十五史随笔

责任编辑 汪维玲(特邀) 邹 亮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封面题字 池长尧

蓟门黄昏·元史随笔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000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239-X/I·1111
定 价 11.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野蛮人”的活力
- 5 在“廉”与“才”之间
- 12 “一官二吏”
- 17 董文忠的批评
- 22 血统政治
- 26 网开一面的元朝科举
- 29 无法无天的“扑买”
- 32 横行霸道的高利贷
- 36 元代的文网
- 43 民间立场
- 47 贫者只宜岩谷隐，草纫橐叶当衣裳
- 52 耶律楚材：在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
- 58 长春真人的西行
- 63 李璫之乱
- 68 在权力的漩涡中
- 76 阿合马之死
- 81 又一个“理财”大臣翻身落马
- 85 这回轮到了桑哥

目 录

- 90 闲说真金太子
97 想起邓牧
103 教育家许衡的故事
108 “廉孟子”廉希宪
112 “纯儒”不忽木
117 郝经的磨难
121 “秀才”赵璧
125 从姚枢的受冷落说起
132 事有难为可若何
140 冷眼向洋看世界
144 惟余笔研情犹在 留与人间作笑谈
151 为政“平恕”高克恭
156 珠帘暮卷西山雨
163 从“惟和”到“无和”
168 孤独的皇帝
173 两都之战
177 脱脱的失败
184 伯颜该当何罪

目 录

188	一位工程技术专家的悲哀
192	扩廓帖木儿与元王朝的窝里斗
196	虞集、郭守敬与明清“西北水利议”
201	人生盗贼岂愿为,天生衣食官迫之
207	养生之道
212	元人与茶
220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230	日落大都
235	后记

“野蛮人”的活力

大约是十多年前，当时还在跟启功教授读古典文学博士学位的郭英德先生，给我们上元代文学课。说起元代东部沿海海运的全线贯通，郭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这大概同蒙古游牧民族飞扬凌厉的习尚、豪放宏大的气魄有关。

后来我读《元史》，感觉郭先生的判断果然大有道理。更有趣的是，给蒙古人出海运点子的，还是两个江南人。

追根溯源，我国的沿海交通，始于上古时代，元朝海运根本区别于前朝历代的特色是：它在东部海域实行全线通航，南起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北至天津界河口，元朝的运输从此形成了以海运为主、内河运输为辅的格局。

元代的海上运输，大体始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这一年，中书左丞相伯颜（这个伯颜不是后来元王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时的权臣伯颜）从至元十三年经海路搬

运宋室库藏的旧例中得到启发，最关键的是，江南人朱清、张瑄这时候给伯颜出主意，说可以从海路运输漕粮，这样会比河运提高输送效益。伯颜和当时元王朝的最高领袖忽必烈也没有多少犹豫就采纳了这个建议。设想一下，在这长达万里的海上运输线上，复杂的水文地理，变幻莫测的气候，困难不知会有多多少少！但是元朝领导人就有这个魄力尝试做这件事。

说来几乎不可思议的是，给伯颜出主意的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原先都是南宋时的“海盗”，此时都出来替元朝政权效力。换句话说，这些极富破坏性的海盗，要到蒙古人统治时，才能将其破坏性能量转化成建设性能量：由做劫掠成性的海盗而转为替朝廷从事海上运输。细细想来，这也不奇怪。在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的“重文轻武”国策，中国社会风尚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向，“白面书生”几乎成了宋王朝各级政府文官的典范。连范仲淹这样的名将也对喜欢谈论兵事的青年张载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加之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到宋代的高度完善，这个王朝的官员几乎不再有多少宏大的气魄和广阔的想像力了，他们在这架专制政体的机器上运转，仿佛得了严重的“贫血症”。而正是在民间，尤其是在远离纲常秩序的社会边缘，多少还保存着一些强悍的生命力，这些生命力释放出来的能量，多半是对社会具有破坏性的，譬如像朱清、张瑄这样的“海盗”。只有未被儒化和弱化的蒙古游牧民族领导人，譬如丞相伯颜、

皇帝忽必烈，才有气魄和能力起用“海盗”，接纳这些“海盗”的建议，把这些“海盗”的破坏性能量转化成建设性能量。尽管这样的转化，对伯颜、忽必烈们说来，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他们在主观上未必已经明确认识到这种能量的转化。

蒙古人入主中原，虽说是属于文化上相对落后的民族统治文化上相对先进的民族，但也可以看做是给因高度文明而不免患“贫血症”的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两个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民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交流时，我们通常会想到马克思的名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当然是一条真理。但另一方面，文化落后的民族也会对文化先进的民族发生正面的影响，在这方面，恩格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名言：“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元朝帝国的力兴海运就是这句名言的一个极好的例证。两个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并不只是单向的。在元代汉蒙两族的冲突和交融中，如果说汉民族对蒙古族作出了“文明其精神”的努力的话，那么，蒙古族也对汉民族作出了“野蛮其体魄”的贡献。如果说，中国社会风尚自宋代开始发生由“尚武”向“崇文”的整体转向的话，那么，元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风尚则发生了一次“尚武”的回光返照。蒙

古游牧民族的人主中原，击打出了汉民族体内的血性和活力。

至元二十年的首次海运成功，使整个元廷深深地看清楚了海运成本大大低于水陆转运和河海联运这个好处。从此，元代大规模地使用了海运这个手段，直至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四十多年一直保持强劲势头。元代海运因此有“一代之良法”的美誉。朱清和张瑄在至元二十年分别被授为中万户和千户，二十二年又分别被授江东道和淮东道宣慰使之职，朱清还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据说元世祖忽必烈对丞相伯颜讲过这样的话：“朱、张有大勋劳（指开创海运），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不过，朱清、张瑄两人后来终因飞扬跋扈、贪赃枉法而遭人痛恨，在成宗皇帝铁穆耳当朝时，死于非命。这是后话了。朱、张后来的劣性复发、不可收拾，其实也是元王朝官员管理方面极端腐败、姑息养奸所致，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廉”与“才”之间

有元一代，绝大部分时间是废除科举的。虽然从忽必烈时代开始，朝廷几次议行科举，但通常都被视作不急之务，没有多少用场。一直到了仁宗皇帝时，才正式开考取士，此时元王朝已开始走向下坡路。所以科举制度即使被正式施行后，它对元朝已有的官僚集团的构成实际上没有起到多少改变的作用，它对元王朝的统治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自从延祐年首科乡试后，元朝政府共举行科举考试十六届，正榜取士凡1200人左右，其中后来升至三品及三品以上职位的大约仅百人。此外大部分，“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见傅若金《送习文质赴辟富州吏》）而元代的内外诸官员数，以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成书的《元典章》为据，仅色目人和汉人官员就达26690员，如果加上蒙古人官员，那么数目会更大。

元祐后正榜取士的总人数 1200 人左右,跟这数万人的官僚集团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姚大力教授在《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 1982 年《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6 辑)里说:元后期举行的 16 次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 1139 人,这个数字仅占同时期文官总人数的 4% 略多一点。有元一代的高级军政官员,几乎全部出自勋贵子弟。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监丞序》里就说:“方今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中下级官员很大部分也由吏员晋升。科举取士不起实际作用,那么,如何任用官员,就得有另外的标准了。

实际上,元朝政府的选拔任用官员,其标准通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见杨维桢《送范致道序》)在元朝统治层看来,廉而无才,自然是迂腐不堪任用,两相比较,那当然还是不廉而有才的人有实际的用处,能办事。蒙古游牧民族马上杀伐,冲锋陷阵,他们没有汉民族中原社会的儒学文化背景,其风俗重实崇用,不尚虚文。在取材用人上,也没有中原儒学的那种“伦理化”倾向,所以忽必烈、大将伯颜就能起用南宋“海盗”朱清、张瑄,朱、张首倡海运,也果然为元王朝出了大力。元王朝的这种用人作风,大概很会获得我们这些对儒家“伦理化”取材用人的弊端看得比较清楚的现代人的同情和好感。可是问题的症结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这样的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里,没有舆论的监督,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民主机制,不廉而才的各级官吏真的能有效地担负起职责么?

不廉而才真的就比廉而无才更好一些么？

譬如忽必烈时期的理财权臣阿合马，不可谓不能干，他以回回人人相，帮忽必烈搜刮了不知多少钱财，但他在任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阿合马全家“尽处要津”。阿合马要搞“理算”，“理算”对象本应是侵吞中饱的贪官和隐产逃赋的豪富，可是阿合马“亡廉而才”，贪婪成性，把官职都分派给了那些向他献美女、行贿赂的奸邪之徒。此辈人做官就是要狠捞一笔、大发横财，把向上级拍马屁送出去的钱财再从另外的渠道千百倍地搜刮回来。阿合马任用这样的人去“理算”，事情能做得好么？果然，这些人去“理算”，流毒民间，老百姓受到残酷的盘剥，贪官豪富纷纷把“理算”钱财转嫁到平民百姓头上，招致天怒人怨。以致后来阿合马被诛杀时，大都城中平民争相沽酒庆贺，燕京酒市三日俱空。

譬如燕铁木儿也是非常能干的大臣，史学家黎东方先生说他是“元朝历史上空前的权奸”（见《细说元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奸”而能“权”，而且“空前”，可见其能量之大。这个“空前的权奸”，确也是有胆子，有魄力，有谋略，他把元朝的帝位夺归海山一系，又扶助图帖睦尔上了台，做了皇帝（即文宗皇帝）。可是这个大臣虽然能干，却也实在利欲熏心，毫无道德。他胆子大到连泰定皇帝的妃子都敢娶为夫人，按照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看，简直是无法无天。这样的人，为一己私欲所驱使，以手中的大权替自己占尽天下良田，纵

淫无度。虽然手执军国大权，也有才能，却不能替国家、百姓办事出力。这个燕铁木儿后来因荒淫无度而身亡。

再譬如被朱元璋赞许为“奇男子”的王保保，纵有才能，也只是匹夫之能，为一己的权力欲所诱惑，身为元朝大臣，握有重兵，不识大体，无道无德，一意孤行，不南下平乱，却在北方挑起军阀混战的局面，致使元朝因内部力量陷于内讧而加快崩溃的速度。这个“亡廉而才”的王保保，到底能不能管用顶事，不是也很清楚的了么？

如果说元王朝高级官员的“亡廉而才”对元王朝的“速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那么在下层的吏员中，“亡廉而才”是不是要比“吏廉无才”更好呢？元朝的“衙蠹”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都是空前的。由于元朝任用吏员也是看重“才”而不重“廉”，所以吏员中普遍的情况是道德感非常弱，寡廉鲜耻，有的涂改文书加重税收，多余的归自己所有；有的先收百姓赋税，而在国家宣布蠲免之后却并不退还于民，而是自己独吞，致使国家的政策不能惠及于民；有的吏员任意改动不同人户的纳赋承役标准。“破家坏产者……大半尽于吏家矣。”宋代司马光这句话所述的情况在元代更是普遍。在国家法律事务中，由于元代各级官僚“大半不识文墨，不通案牍，署衔书名，题日落笔，一出于文吏之手”（见胡祇通《精选县令》），所以元吏手中的权限就更大。这些恶吏欲壑难填，擅改文书案牍，舞文弄法，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所以孔克齐就说：“士吏之罪，不容于诛。凡教猥升木，吹毛求疵，为害百

端，败坏风俗，吏之所为也。今天下扰攘，城池残破，舞文弄法，助虐济奸，吏之所为也。吏之为害深矣哉！”（见《至正直记》）这些“亡廉而才”的吏员的所作所为，从社会的下层蛀空了元王朝的基础。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或少数人掌握着公共权力，他们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法律的约束、社会的监督。他们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和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家天下和等级制是这样的人治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假如做官的自己不能清廉，那么还有谁能够阻止他们去巧取豪夺呢？不受约束的权力肯定会导致腐败。“亡廉而才”的结果在整体上也必定会把个人能力引向巧取豪夺的歧道。在无法律约束、无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能力也会因膨胀的私欲而蜕变。而私欲如果没有有效的外部约束，通常情况下都会膨胀，因为人非圣贤。在这样的人治社会的背景前，我们再来看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再来看儒家的注重个人道德品质的取材用人标准，那么，儒家的主张也许确实有其非常深刻的含义，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它的出发点是想对中国人治社会作一些弥补。换句话说，儒家关注个人道德品质的用人标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入治社会的背景中产生的，它是对人治的必要补充。如果说在西方法制社会里有法律和舆论的约束和监督，个人能力标准可以放在第一位的话，那么在入治社会里，当外在的

法律约束和舆论监督都缺乏的情况下，也就只能依靠道德的约束了。如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治社会里，连各级官员的个人的道德品质都可以不重视，连这样一种重视各级官员个人道德品质的用人主张都要被无情抨击和严厉批判，都要被取消，那么，这实际上是对各级官员的最后的约束力，于是一切都可所欲为、大开其道。在中国还没有从人治社会进入法制社会之前，在中国人治社会依然故我的情况下，争论究竟是“吏廉无才”好，还是“亡廉而才”好，这在理论上永远是非常无聊的。在中国还没有从人治社会进入法制社会的前提下，对各级官员的选拔任用，奢谈“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之类的高论，在客观实际上，也等于是在为贪官污吏和起用贪官污吏鸣锣开道，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选拔官员纯以道德为标准，当然不行，流弊所至会造成伪道学、伪君子的泛滥。再说，就算真有道德，不会做事又有什么用处呢？“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这样的人会误事。而用人“亡廉而才”，不讲道德，更是误事至极。受儒学影响最小的元王朝在其建立后几乎国无一日之宁，后来又速亡，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元王朝，若从成吉思汗公元1206年建蒙古汗国于漠北算起，到元顺帝退出中原、朱元璋占领大都（公元1368年），首尾163年；若从元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占领中原算起，则寿命为134年；若从忽必烈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算起，则首尾不过98年；若